

学术 视点

远航,永无止境

——马敏教授谈辛亥革命史研究经历及其发展思考

本报记者 谢颖

编者按:

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史学界将举行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近几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空前繁荣,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不断走向深入。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40多年来致力于辛亥革命研究,围绕辛亥革命史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成果。日前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马敏,讲述辛亥革命史研究生涯的经历以及新时代不断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思考。



马敏(左)陪同章开沅先生考察灾民古城

以辛亥革命研究走上治学之路

学术家园: 您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为什么会选择历史专业?

马敏: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读历史系,可以说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机缘偶然。从高中开始,我就对哲学和历史非常感兴趣。1974年高中毕业,我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插队做知青,随身行李是一箱子书,主要是哲学和历史类书籍,比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曾反复地看。1977年恢复高考,我在建筑公司当工人,一边上班一边复习,填报志愿时,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两个专业。不过,我的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录取,却非常奇怪地收到了并没有报考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原来,因为历史成绩较好,招办的老师向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推荐了我,系里两个老师专程到招办,经过考察录取了我,正是这个机缘决定了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和学术轨迹。

77级的大学生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刻苦,更为难得的是,当时老师们也都特别好。我们大一在京山分校半年,老师跟学生住在一块,宿舍是挨着的,基本上天天在一起,课堂上、生活里,随时可以请教,完全沉浸在学术中。记得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老师还跟我们一起去鱼塘游泳,游累了坐在溪边乘凉,聊学问,学生们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讨论很热烈。那个情景就好像大鱼引着小鱼,既是导游,又是导学。

学术家园: 能回忆一下当时学习印象深刻的事吗?

马敏: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一堂课。他给本科生讲的课不多,一般以专题课的形式进行,正是他的一堂课,决定了我走上学术的道路。那堂课上,章先生给我们讲他在苏州发现的商会档案,这批档案时间跨度从晚清到1956年工商业改造,先生由此讲了商会研究、社会群体研究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关系。我当时听得入神,从一个这么小的切入点能进入如此广阔的学术天地和深厚的学术境界,深为钦佩章开沅先生的学术风范。课后,我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了一篇小文章,没想到两位任课老师刘望龄和李子林看到这篇文章后亲自来自学生宿舍找我,说看了这篇习作,觉得我对研究近代史、辛亥革命很有基础和天赋,问我有没有志气报考章开沅先生的研究生。老师

们的鼓励让我激动万分,当即下定决心并开始积极准备。后来先后幸运地考上章先生的硕士生、博士生,以辛亥革命研究为专业方向,走上了治学之路。

面向社会,走向纵深的辛亥革命研究

学术家园: 您的治学之路从辛亥革命开始,当时是怎样进入这个领域的?之后又怎样展开?

马敏: 我的学术研究是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开始的。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权威,章开沅先生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基本思想是:不仅研究辛亥革命本身,还要从革命扩展到研究社会,通过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和群体。1982年,在章开沅先生的安排下,我与同学朱英随刘望龄老师到苏州市档案馆,参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整理档案是一种极好的治史训练,对于刚踏入学术领域的我来说,建立了从第一手史料出发的实证史学思维,并且受到了规范的学术训练,如档案里的历史称谓、格式等等。我在苏州待了半年多,后来以此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汇编前持续了30余年,直到2012年完成《苏州商会档案从编》的全集出版,共6辑12册,约900万字,成为中国商会史研究重要的资料库,同时,我们也开辟了商会史研究的新路径,形成了独特的商会史学派。

198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在广东中山召开了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规模很大,论文有100多篇,中外学者济济一堂。作为青年学者,我们提交的论文要经过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和选拔。我的论文《论孙中山伟人品质》与同学桑兵、韩明的文章引起了专家们的重视,被选在会上做大会发言。在那篇论文中,我把个性心理学的方法引入孙中山研究。大会发言后,胡绳等前辈们对我们鼓励有加,还有日本著名学者野泽丰、美国著名学者周锡瑞等都主动找我们谈话,认为中国新一代学者很有希望。这次会议奠定了我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坚定信心。

在苏州整理研究商会档案过程中,我

发现了大量关于博览会的内容,比如中国怎么到国际上参加博览会,怎么自己开博览会等。商会参与了很多博览会,而在当时,博览会是中国与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我觉得很有意思,便跟刘望龄老师说,目前的汇编没有列博览会的栏目,建议加一个“商品展览与赛会”栏目。后来,刘望龄老师和苏州档案馆的叶万忠老师听取了我的意见,增加了这个栏目,从此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博览会史。

后来,章开沅先生认为过去西方传教士办的大学非常值得研究,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华中大学,就是华中地区著名的教会大学,有较为丰富的档案资料,我们便率先在全国开始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1989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一届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在全国各地召开了10多次,出版了很多学术论著。

从革命到社会,在章开沅先生的指引下,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既涉及广泛,又走向纵深,富有活力。

坚持“求实存真”的学术特色

学术家园: 作为章开沅先生的学生,您对他先生的为学为人有什么感受?先生对您有什么影响?

马敏: 在求学和治学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章开沅先生。今年5月28日,先生驾鹤西去,留给人们无尽的怀念。每当回味和思考他的理论和风范,都能获得新的收获。

“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这是章开沅先生总结自己学术生涯的话语。虽然先生很谦虚,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两大领域研究的重视。其实,章开沅先生在辛亥革命史、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包括张謇研究、商会史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中国教会大学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影响深远。

“求实存真”是章开沅先生最鲜明的学术特色。记得考上他的研究生后,他亲手给我们书写了楚图南先生给戴震纪念馆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两句话是他最为推崇的名言,

他的书斋也命名为“实斋”。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就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在他看来,治史最高的层次和史学家最应该追求的是真善美,要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并且认为史学研究“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我想,这便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最好注解吧。

于我而言,章开沅先生既是恩师,也是慈父。我在学术道路乃至人生道路上的很多重要节点,都离不开他的点拨指导。他经常是发现一个好的研究领域,就放手让学生去做,而我们的成绩,是因为站在他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才获得的。对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他这样说,“40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我为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耗费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

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学术家园: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您发表了多篇文章,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如何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并推动其不断深入发展?

马敏: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回望辛亥革命的历史,如何看待和评价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如何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无疑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辛亥革命史研究尽管成果丰硕,但也还远未达到尽头,关键在于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与新的思路。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时,章开沅先生在谈及辛亥革命的意义时,曾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要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必须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即百年历史背景、百年历史本身和百年历史展望”。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要将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及其影响的理解和探索,放在一个足够长的历史视距中,作贯通性、通盘式的考察,从而揭示辛亥革命深层次、长久性的历史影响。循着这个思路,如何进一步放宽历史的视野,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复杂性,深化相关研究,是我近年来着重思考的问题。

比如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复兴,将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近代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孙中山率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辛亥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对外交往等方面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初步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当然,这些转型,在辛亥革命后还只是初步开始,并没有真正完成。辛亥革命无论是在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以及革命的广度和彻底性上,都还存在致命的缺陷,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只是初步展开,更大的高潮则在后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继承辛亥革命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又超越了辛亥革命,将中国和中华民族带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使孙中山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的美好愿望正逐步得以实现,中华民族正以更伟岸的身躯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冷却,再用史料丰富自己,再去写,又不一样。由冷到热再由热到冷,才能写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好的学术著作。”在此基础上,2013年,马敏团队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博览会史》,做到现在又已是8个春秋。

板凳不怕十年冷,这是马敏从恩师章开沅先生那里传承的学术品格。同样传承的,还有“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创新精神,不囿于某一固有领域,不满足于业已取得的成就,不断扩展学术空间,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而引领新的学术潮流。

传承创新,生生不息,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是已经画上的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

谈文 论艺

电影《长津湖》于9月20日,作为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首次放映,笔者有幸作为首批观众观看了这部震撼人心的战争大片。影片中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排山倒海的视听语言、如诗如画的江南美景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长津湖》用现代化的视听震撼回顾了70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志愿军不畏艰险、以弱胜强的抗美援朝精神。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影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点带面地全景展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

电影《长津湖》虽然聚焦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长津湖地区围剿美军的一场战役,但并不局限在这场具体的战役之中,既体现了这场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意义,又高屋建瓴地展示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本身对我国国家战略安全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历史意义。

《长津湖》由上到下地交代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全局战略,也由下到上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对和平发展的渴望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影片从毛泽东到每一个普通百姓都不想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重燃战火,但在敌人反复挑衅并轰炸我国领土后又不得不奋起反击、保卫家园。《长津湖》全面展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属性和历史价值,为接下来每一场残酷的战斗提供了思想动员的根基。

每一个指战员都清楚地明白这场战争是为谁而战,是我军百战百胜的思想法宝。而让每一个观众都明白数十年前的军人为谁而战,也是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吸引人、打动人、教育人的思想法宝。从这一点来说,《长津湖》是电影传承和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佳作。

二、挖掘抗美援朝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传承。

电影《长津湖》厘清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并荡漾了好莱坞战争片的“反战”影响。影片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入手,探究出了一条根植于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的中国战争片新形态。影片从风景如画的南方水村开始,以探家老兵连长伍千里为视角,描绘了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群众对建设美好家园的向往。然而伍千里一家分地盖房的愿望被美军干涉朝鲜内政、波及中国领土的战火打破。伍千里不得不告别父母家人,返回部队,拒敌于国门之外。影片开头如诗如画的幸福生活随后情节中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江南水乡的情节段落落在开头就为整部影片建立了独属于中国的文化底色,是半个多世纪前《上甘岭》电影主题曲中“一条大河波浪宽”的精神延续。

另外,影片多次展示了志愿军“风林火山”般的战斗素养,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昂扬的斗志和严明的纪律。“风林火山”出自《孙子兵法》,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军队提出了极高的标准。在影片中,出自《孙子兵法》,是我军的精神呼应。从这个角度来说,《长津湖》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历史精神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了与好莱坞战争片类型范式完全不同的中国战争片之路。

三、正面讴歌了志愿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长津湖》多角度展示了我军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之间的军事工业和后勤保障的差距。从军事设施的角度来看,美军飞机、坦克、大炮、卡车一应俱全,而我军只能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从住宿修整的角度来看,美军住在温暖坚固的临时营房之中,而我军只能风餐露宿,在冰天雪地上和衣而眠。最为明显的对比是两支部队饮食保障的对比,我军战士只能窝在冰窟窿里啃食每天一个的冻土豆,而美军士兵则在欢声笑语的感恩节氛围中大快朵颐。

当然,以上关于军工水平和

《长津湖》: 中国特色战争类型大片的新阶段

侯光明

后勤保障的对比大量出现在我国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影视作品之中。而《长津湖》脱颖而出的优点,是用鲜活的情节写出了我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一把炒面一把雪,以苦为荣、顽强拼搏,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敢打必胜的乐观信念。

这种精神是我军指战员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重要特点,也是我军题材影视作品中的灵魂主脑。如果没有拍出我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浪费了题材的核心价值,可能会沦为庸碌之作。

总的来说,《长津湖》是近年来涌现的一批新主旋律大片中的佼佼者,推动中国特色战争类型大片走向了新阶段。影片在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国产战争片的宝贵精神财富基础上,汲取了近年来同类作品的经验教训,较好地实现了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和中国特色的革命精神之间的统一,是中国战争片的新突破。

从《流浪地球》到《长津湖》,我国电影行业已经逐渐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科幻片和战争片的大类下独立自主地发展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东方商业类型片,实现了电影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突破。电影行业是文化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文化强国既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涵,也是电影产业自身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中国电影充分挖掘、传承并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对文化强国的建设工作起到有力地推动作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记者手记

史学研究的冷与热

本报记者 谢颖

2010年,上海世博会惊艳亮相,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风采,成为世界各国沟通交流的大舞台。而这次盛会的筹备与举办也提供了一个契机,让博览会成为学术文化热点,学界开始广泛关注博览会史研究的重要性。

彼时,马敏的近代博览会史研究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但也可以

说,坐了多少年的冷板凳。随着博览会研究逐渐“热”了起来,马敏及其团队成果也被更多人了解,记者就曾约请他撰写了《百年梦圆:中国与世博会》一文,从历史的角度为读者解读世博会。

采访中,马敏说,自己当时有一部书稿已经完成了初稿准备出版,但

因为上海世博会即将举行,他决定不出版了。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原来,基于学者的敏感,他认为博览会史热度升高会促使很多新的史料面世,要继续丰富史料对书稿进行完善。此后事实也确实如此。“做学问要从坐冷板凳开始,但到了热起来,作为史学家要自